



● 作者/Graham Allison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劉宗翰

「中」美關係： 管理下一個文明衝突論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取材/2017年9-10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2017)

根據文明衝突論觀點，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仍然存有一道鴻溝，文明間無法相互包容，美國與中共正是最佳的代表。當中共這樣的一個崛起強權，威脅到美國既有強權時，雙方是否將陷入修昔底德悲劇？不管理論如何推演，唯有領導人發揮智慧，才能避免衝突發生。



杭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預測了西方與伊斯蘭文明的鴻溝，也點出美國與中共衝突的原因。(Source: World Economic Forum/Peter Lauth)

當美國人察覺到中共崛起且在各方面都成為美國的競爭者時，許多人還天真地認為，隨著中共愈形富強，其將會步入德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後塵，

經歷深層轉型且蛻變成爲一個進步的自由民主政府。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士認為，中共已喝下這種調合了全球化、市場主導消費主義，還有整合到以規則為主國際



秩序的神奇雞尾酒，最終將使其從內部質變成為民主國家，同時發展成為前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所謂，在國際上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

已故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可不這麼認為。他於1993年在《外交事務》季刊所發表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章中認為，文化斷層帶將成為後冷戰世界的一大特點，這解釋了一些國家為何無法融入全球自由世界秩序之中。杭廷頓的論點之所以在今日被想起，主要是因為他預測到「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存有一道鴻溝——這是911恐怖攻擊及其後續效應最為鮮明的剖析。但是，杭廷頓認為以美國為首之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間的鴻溝同樣是深刻、持久且必然的。正如他所主張，「『全球共通文明』想法的出現，有可能是一個源自西方的理念，而且這與大多數亞洲社會所抱持特殊主義及強調人人有別的概念並不一致。」

自從杭廷頓發表該理論後，隨著時間過去，這個論點逐漸穩固，而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將會使之更加強化。杭廷頓認為美國是所謂西方文明的象徵，美國與中共之間在價值觀、傳統及哲學觀上的關係緊繃，將會加大對雙方關係基本架構的壓力，尤其又發生像是中共這樣的一個崛起強權，威脅到諸如美國這樣的既有強權之時。

這種轉變往往會導致以古希臘歷史學家為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衝突，修昔底德觀察崛起雅典和斯巴達統治間的危險動態關係發展。據修昔底德稱，「正是因為雅典崛起，以及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使戰爭的發

生變得無可避免。」對崛起強權而言，其清楚感覺到自己的權力日升，並且希望能獲得更多的影響力和尊重。對既有強權而言，在面對挑戰時會變得更加擔心、不安和具防衛性。在這樣的環境下，雙方之間的誤會將被放大、彼此的同理心消失無蹤，另外原本無關緊要或可控制的事件和第三方行動，則可能觸發雙方從來都不會想要進行的戰爭。

在美國和中共的案例中，修昔底德風險更高的原因在於兩者在文明上無法相互包容，因而加劇了彼此間的競爭情勢，使得雙方更難達成和解。美國和中共之間對國家、經濟、各自角色、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以及時間性質等概念全然不同，可以清楚看出雙方之間的差異懸殊。

在美國人的觀點中，政府是必要之惡，人民要時時提防並限制政府，不使其專橫行事或濫用權力。對中國大陸百姓而言，政府卻是必要之善，其為確保秩序和防止混亂的根本支柱。在美國式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政府會建立並執行規則，在這樣的經濟體中，有時會發生國有制和政府干預的狀況，但卻是屬於不可取的例外。在中共當局主導的市場經濟中，政府會制訂經濟成長的目標，選擇性資助產業的發展，以促進繁榮興盛，並且從事重大、長期的經濟計畫，以促進國家利益。

中國文化並不頌揚美國式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以保護個人權利和促進個人自由程度來衡量社會的進步。事實上，在中文裡「個人主義」有著將自己重要性擺在眾人之上的自私概念。因此，美國歷史中的名句「不自由，毋寧死」若放到中

國，則會變成「不和睦，毋寧死。」對中國而言，秩序是最高的價值，而一個階級制度造就了這樣的和諧社會，人們都遵守儒家思想的主要概念：安分守己。

中國人認為中國應當是位在世界金字塔頂端的大國，其他國家則是理所當然的下層進貢者，這個觀點不僅是中國本土的社會觀，也是中國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美國在這方面的觀點則有一些不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華府不斷防範有「實力匹敵者」(peer competitor)出現來挑戰美國的軍事霸權。但在戰後，美國國際秩序概念中也強調基於規則的全球體系之必要性，甚至這些規則也會讓美國同樣受到限制。

最後，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於時間與時間歷程也有不同的思考。美國人傾向於關注當下，經常以小時數或天數為單位來計算時間。另一方面，中國人則較具有歷史的思維，經常以幾十年甚至幾世紀的時間單位來思考。

誠然，以上這些是對這兩者文化以必要篩選做出的全般概述，並無法完全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但對美國與中共決策者而言，若是想要在不觸發戰爭狀況下處理彼此間的競爭，這些概述就隱含著重要的提醒。

我們最優秀

美國和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就是都有一個極端的優越感，它加劇了兩者在文化上的差異。雙方都認為自己比較優秀，無人能比。但是第一名就只能有一個。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曾懷疑過美國對中共崛起的應付能力。他在

1999年受訪時表示，「對美國而言，不是在全世界，而且僅是在西太平洋區域，被一個長期以來受其鄙視、不屑，被視為頹廢、軟弱、貪污、腐敗、無能的亞洲人所取代，就美國的國家情感而言，這是難以接受的打擊。美國人自認自己在文化上至高無上的優越感，將會讓他們更加難以調整心態。」

在某些方面，中國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比其對手美國更為全面。歷史學家蓋爾伯(Harry Gelber)在其2001年出版的《擺脫帝國的國家》(*Nations out of Empires*)乙書中寫道，「中華帝國自視為文明宇宙的中心，」在封建時代，「中國士大夫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或『中華文明』的想法。因此，除了漢人之外，就只有野蠻人。在這個定義下，任何沒有中華文明的地方皆為蠻荒之地。」

到今天為止，中國人依然對他們過往的文明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中共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的演講中這樣宣稱，「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偉大民族。在中華文明和五千多年的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事實上，習近平在其2014年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乙書中寫道，「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是不同於地球上任何文明的，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成就。」

同樣地，美國人也認為自己是人類文明的先驅，尤其是在政治發展方面。熱愛自由是美國政治的核心信條，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他們是被「造物主所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宣言中特別註明這些權利為「生



中國人對自身文明成就感到無比驕傲，學者認為中國的例外主義甚至比美國更為全面。(Source: Flickr/Ian Sane)

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認為這些都不需要爭辯，並且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正如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言，「不僅是相信這理念，而且化身成為一種理念，就是美國註定的天命。」相較之下，秩序是中國人的核心政治價值，而秩序是施行階層制度的結果。美國人所秉持的個人自由會破壞階級制度；在中國人看來，這會導致失序的混亂。

最好的榜樣

這些哲學上差異都會表現在兩者的政府概念中。儘管美國的締造者是為了強烈不信任威權統治而起義，但他們也認為社會需要政府的治理。否則，誰來保護百姓免受外國的威脅，或者

防止國內犯罪分子侵犯百姓的權利？然而，一個強大到足以履行基本功能的政府若有專制傾向，將使他們陷入兩難之境。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們設計了一個被歷史學家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稱為「不同機構分享權力」的政府。這樣的設計刻意地創造出一個使得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之間持續互相制衡的體系，雖然這會導致政務的拖延、僵局，甚至功能不彰。但它也提供了監督與制衡的功能以對抗濫權。

中國人對政府概念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幾乎與美國完全

不同。正如李光耀所觀察到的，「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記載中顯示，當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北京或南京)時，該國是和平繁榮的。當中央積弱不振時，各省縣就都由小型軍閥所操控。」因此，美國所抗拒那種強大的中央政府，對中國人而言，代表著在國內外推進社會秩序和公共財的主要代理人。

對美國人而言，民主是唯一正當的政府形式：當局的合法性來自被治理者的授權。這項觀點在中國大陸並不盛行，中國大陸百姓普遍認為政府贏得或失去政治合法性是基於政府的政績。在2013年一場具煽動性的TED演講中，來自上海的風險投資家李世默(Eric Li)質疑民主政府的優越性。他回憶道，「我曾被問及，『這個政黨沒有在選舉中由選票獲得執政權，那何來的合法性？』我回答說，

『若它有治國的能力呢？』」他接著提醒他的聽眾，1949年，共產黨剛剛掌權，「當時中國大陸深陷於內戰中、被外來勢力分割，人民的平均壽命是41歲。今日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工業強權，百姓的生活愈來愈富裕。」

華府與北京在國際間推行自家基本的政治價值觀時，也是採用非常不同的手法。美國人相信人權與民主是全人類共有的期望，只需要美國以身示範(有時再加上一些新帝國主義的手段)，就能在任何地區讓這個理念實現。正如杭廷頓在他後來的專書著作《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所寫般，美國是一個「傳教的國家，」由於受信仰影響，致力於「使非西方人信仰西方的價值觀……而且認為在渠等制度中應體現這些價值觀。」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民主賦予的權利對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皆有所助益。

幾十年來，華府一直推行能助長民主的外交政策——甚至有時試圖將之強加給那些未能接受民主的人們。相較之下，雖然中國大陸人民相信別人會尊敬他們、崇拜中華美德，甚至試圖模仿他們的行為，但中共領導人不會為了有利於施政，而迫使他國改變原本信念。如同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指出，封建的中國「不會輸出自身理念給他國，但允許他國前來取經。」毫不令人意外，中共領導人認為美國意圖不軌，希冀改變他們去奉行美國信條。1978至1989年期間執政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他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的進程，曾向來訪的貴賓抱怨，西方所說的「人權、自由和民主只是為了維護強大、富有國家的利益，利用自己力量欺負弱國，追求霸

權，實行強權政治。」

快思考和慢思考

美國人和中國大陸人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覺根本就截然不同。2017年7月，美國人驕傲地慶祝建國241週年；然而，中國大陸人卻喜歡提到他們的歷史已橫跨五千年之久。美國領導人經常提到稱為「美國實驗」的一套美國歷史，有時他們的政策在無意中也反映了這種態度。相較之下，中共則認為自己是世界的支柱，從過去到未來都會是如此。

由於中共領導人對時間的豁達感，所以他們審慎分辨出輕重緩急之間的差別。很難想像，一位美國政治領導人會把一個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凍結一個世代，暫不解決。然而，這正是鄧小平在1979年間所做的決定，當時他領導中共與日本就有爭議的釣魚臺諸島問題進行談判，並且最終接受一個先將問題擱置，而不是立刻解決的辦法。

美國政治人物對新聞周期和民意的需求較為敏感，會採用推特(Twitter)推文發表意見或公開宣布簡單、扼要的政策計畫，以保證問題會獲得迅速解決。相較之下，中共領導人在戰略上是有耐心的：只要趨勢朝著對他們有利的方向發展，就樂意等待問題的解決方案出現。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問題的解決者，這反映出短視近利，他們把問題視為是一些離散的事件，需要現在就完成處理，如此才能繼續解決下一個問題。美國小說家兼歷史學家維達爾(Gore Vidal)曾經稱他的國家是「健忘的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這裡每一個點子都是一種創新的想法，每一場



危機都是前所未見的。中國大陸人則認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種深層歷史感和制度記憶與美國人形成鮮明對比。

事實上，中共領導人往往認為許多問題無法立即解決，必須靠管控的方式去處理。他們認為各種挑戰要靠長期與反覆的處理；他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要一年、十年，甚至是一個世紀的演化過程去解決。今日他們採取的政策措施只為促進此一過程演化。例如，自1949年以來，臺灣一直被北京視為反叛勢力的中華民國所統治。雖然中共領導人堅持臺灣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們一直進行一個長期的戰略，在經濟上壓迫並使中華民國社會動盪不安，要把這個島嶼慢慢地拉回去。

誰才是老大？

美國與中共的文明衝突，使得雙方更難以擺脫修昔底德陷阱，因為該陷阱源自於彼此對世界秩序看法的不同。中共對待自己人民的方式，也同樣是與周遭弱小鄰國的互動方式。共產黨藉著威權階級制度來要

求人民尊重和服從政府，以維持內部秩序。中共國際行為反映出對世界秩序有著類似的期望：2010年的東協外長會議上有一段意外插曲，當時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回應共軍在南海軍事擴張的控訴，脫稿告訴該區域他國外長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中國大陸是一個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事實就是如此。」

相比之下，美國領導人所希望的國際法規，實質上就是美國國內法規的放大版。同時，他們也了解在霍布斯(Hobbesian)全球叢林中權力的現實面，在叢林裡當獅子要比當羔羊好。華府為了調和這種緊張關係，經常試圖描繪美國是一個仁慈霸權，扮演世界立法者、警察、法官和陪審團的角色。

華府敦促他國接受由其主導、以法規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是從中共角度看來，這個法規似乎只能由美國人制定，而其他國家就只能遵守美國的命令。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將對這種預期會引起中共的憤慨感到再熟悉不過。鄧普西

在2016年接受《外交事務》雙月刊採訪時表示，「有一件關於中共的事情讓我傻眼，就是每當美國和中共談論國際標準或國際行為準則時，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指出，這些規則是當他們在世界舞臺上缺席時所訂定的。」

分道揚鑣

美國身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已經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此期間，華府對世界事務具有巨大影響力，重點在於要使其他國家菁英和領導人理解美國文化和美國的戰略方針。另一方面，美國經常覺得他們不需要太認真考慮他國的世界觀——這是因為許多美國菁英相信全世界都已逐步美國化，更加深了對他國觀點欠缺了解興趣的想法。

然而，近年來，中共崛起使這種漠不關心受到質疑。美國決策者開始認識到，他們必須提升對中共的理解——尤其是中共戰略思想。美國決策者特別開始注意到中共決策者對軍事武力使用的獨特看法。中共領導人在決定是否、何時和如何攻



中共崛起的事實，使美國不得不將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擺在首位。圖為2017年11月美國總統川普赴「中」進行國是訪問，於故宮「暢音閣」欣賞傳統京劇。(Source: AP/達志)

擊對手時，絕大部分是理性和務實的。然而，除此之外，美國決策者和分析人士已經確定了五個假設和偏好，為雙方在對峙時中共可能的戰略行為提供進一步線索。

首先，無論是在戰時或承平時，中共戰略毫無疑問是由現實政治所驅動，而且不需要證明其行為是否合乎國際法或道德規範。這使得中共能夠彈性行事，因為它很少受到過往的原則所約束，而且也不怕自己的不一致性行為會遭到批評。例如，季辛吉在1971年抵達中國大陸，開始進行關於美「中」建立友好關係的祕密會談，他

發現和他對談的中共官員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對中共利益是非常坦率。季辛吉和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都覺得有必要證明，他們最終達成妥協是為了「和平光榮」地結束越南戰爭，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則完全不避諱地認為與資本主義美國建立關係，可以提升共產主義中共面對蘇聯的地位，他在某種程度上認為這樣可強化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國際運動。

正如中共對處理國際政治的務實作法，以及極為強調整體戰略的世界觀，都比美國更具優勢。中共的計畫人員認為每件事都環環相扣。中共把



在戰略情勢中持續變化的環境稱為「勢」。這個字沒有對應的英文翻譯，但可以被詮釋成：在特定時間的任何情況下，內在的「潛在能量」或「動能」。「勢」包括地理和地形、天氣、戰力平衡、奇襲、士氣和其他諸多因素。季辛吉在2011年所撰《論中國》(On China)乙書中寫道，「每一個因素都會影響其他因素，勢必會引起動能轉移和相對優勢的微妙改變。」因此，一位熟練的中共戰略家在其大部分時間裡，都是耐心地「觀察和培養戰略局勢的變化，」然後，在一切都達到最佳的配合時，迅速地出手打擊。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結果必然是成功的。

對中共戰略家而言，戰爭主要是在心理與政治層面進行。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對手對地面態勢的理解，其實跟現實狀況本身一樣重要。對中國歷代王朝而言，創造和維持自己是至高文明的形象，以致於可自稱「宇宙的中心，」就能發揮嚇阻敵人不敢挑戰中國霸權地位的作用。今日，在敘述中共必然崛起，以及美國不可逆轉的持續衰退，也有類似這個理論的作用。

中國人在傳統上不是以決戰來謀求戰爭勝利，而是採取漸進行動來逐步改善自己的地位。雷霆(David Lai)是亞洲軍事事務專家，他比較西洋棋與中國圍棋的差異，來說明這種概念。在西洋棋中，棋手試圖主宰棋盤的中央來征服對手。在圍棋中，棋手試圖圍困對手。如果西洋棋大師能向前算計到五或六步的棋路，圍棋大師會算計到二十或三十步之後。中國戰略家會注意自己與對手每一層面的關聯，不會在時機尚未成熟時貿然求勝，而是以持續累積優勢為目標。2004年，雷

霆為美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做的分析中寫道，「在西方傳統中將重點放在動武；戰爭藝術大多被限制在戰場上使用；戰鬥的方式則是兵力對抗。」相較之下，「圍棋背後的哲學……是為了爭取相對利得，而不是要求完全殲滅對手的部隊。」雷霆提出一個明智的提醒，他警告道，「以下西洋棋的心態下圍棋是很危險的。」

來談條件吧

華府需要正視這項警告，在接下來的數年內，各種磨擦的火花都可能造成美「中」關係危機，其中包含進一步南海領土的爭端，以及北韓急速發展核子武器造成的緊張局勢。由於中共軍力目前還落後美軍至少十年以上，因此對美國在使用任何致命武力的選項上都會更為小心謹慎。北京會讓軍力成為外交政策的附屬工具，不是用來在戰爭中取勝，而是用來達成所望目標。中共會加強對於鄰國的外交與經濟聯繫，使它們更加依賴中共，並利用經濟力量來鼓勵(或脅迫)鄰國在其他議題上的配合。雖然中共通常將戰爭視為最後手段，但當其認為長期趨勢已經不往自己這邊靠攏，並且發現自己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時，就有可能會發起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來逆轉趨勢。

美國上一次面臨極高的修昔底德風險是在冷戰期間——特別是在古巴飛彈危機時。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危機解決後幾個月進行深刻反省，領悟出一個歷久彌新的教訓：「最重要的原則，即在維護自己切身利益的同时，與擁有核武大國在互相對峙時，必須避免迫使對方從對抗中選擇屈辱的撤退，或者從事核子戰爭二選一



學者認為，若美國能瞭解中共的國際角色與核心利益，就更能與其進行談判並解決問題。(Source: Reuters/達志)

的狀況。」儘管莫斯科的言辭強硬，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最終決定，他要在古巴的核武危機上妥協。同樣地，季辛吉和尼克森後來發現，中共的毛派思想家在追求利益時，非常擅長給對方留下餘地。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都聲明不願妥協，特別是在南海議題上。不過好在雙方也都是媒合者(dealmaker)。

川普政府要是能更加了解北京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和核心利益，就能有更好的準備來跟中共談判解決問題。心理投射仍然是問題：即使經驗豐富的國務院官員，也會時常誤判中共的重大利益與美國相同。目前在川普政府中負責和中共打交道的官員，夠明智的話就應拜讀中國古代哲學家孫子的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作者簡介

Graham Allison 係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道格拉斯·第隆(Douglas Dillon)政治學教授。本文是擷取自其 2017 年出版的《命中註定的戰爭：美「中」能逃過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Copyright © 2017,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